**出国潮中的缓冲带：中外合作大学的个人需求和影响研究**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张冉 马万华**

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我国的中外合作办学已经初具规模，办学形式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高等教育阶段，中外合作办学的形式包括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外合作办学二级机构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其中，以宁波诺丁汉大学、昆山杜克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等为代表的中外合作大学最具有国际影响力，也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注入活力。本文致力探究，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我国的学生和家长是出于什么考虑选择中外合作大学？这种个人选择行为又对我国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研究者于2016年4月初赴位于华南的某中外合作大学进行调研，访谈了十名学生，并搜集了该校的入学、就业以及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等数据。与一般的问卷研究不同，本文的目的并非简单地列举出影响学生高校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而是通过对质和量两方面的数据分析，试图提炼出学生对中外合作办学的需求及其影响的若干特点，以期对我国中外合作大学的发展、对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的制定乃至对我国本土大学的教育改革具有更加深入的启示作用。

**性价比的考量与社会分层**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讲，学生根据他们预期的进入相关学校的成本和收益来进行选择。研究发现，在谈及学费时，学生会将其与预期的收益联系起来，进行“性价比”的考察。受访学生小南说，“大二6万，大一8万。这个学费比起国内的学校来说，当然是挺高的。但是，怎么说，如果把它当作投资来讲，就是说，能够花这些钱在这四年里面不浪费时间，你学到的是你将来可以用的，这个钱就不会是浪费。可能是当时介绍人把这个教学模式介绍得挺吸引的，你花这么多钱，四年时间，买的不是考试、傻学习，那也值得。”

但毕竟中外合作大学的学费相当于国内大学的十倍还多，该校的暑期项目和认证项目还都“另算”，“每个几乎都一万多”。因为是全英文授课，所有的书都是进口的，价格不菲。加之一个月两千左右的生活费，一年下来，即使不参加暑期项目或认证项目，必需的也要十万左右。无怪有学生提到，“就算我觉得它很合理，但是不妨碍我觉得它很贵”。

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家庭通常家境较为富裕，愿意也有能力花较高的价格，为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学生们普遍反映，“爸爸妈妈说，只要你好好学习，钱就不是问题”。这同时体现了，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就学选择也是一个社会分层结果。

**地理位置的吸引与人力资本的输入效应**

地理位置也是学生和家长在选择高等院校时的重要考虑。该中外合作大学地处华南，与港澳交流方便，对学生有吸引力。从学生就业的角度来讲，已有研究表明，在靠近未来就业地的地方接受高等教育，对就业更有帮助。而且，我国现有的中外合作大学或是在长江三角洲，或是在珠江三角洲，都是经济非常发达的地方。从师资的角度而言，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更易于吸引人才来任教。加之中外合作大学的教师待遇相对高，中外合作大学的教师质量可能会高于同录取分数段的普通高等院校。

该校的学生就业数据也验证了，其毕业生很多都在该校所在的区域就业。该校2015年实际参加就业的309名学生中，204名学生留在了该中外合作大学所在的省份就业，占66%。进一步考察该届学生的入学数据发现，2011级学生中，来自大学所在省份的学生占41%。也就是说，该中外合作大学所在的省份成为人力资本的净流入地。建立中外合作大学可能会为当地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海外留学的未来目标与绑定效应**

本科毕业后直接就业只是一部分学生的毕业选择，更多中外合作大学的毕业生选择出国深造。在该校2015届毕业生中，选择就业和自主创业的占31%，选择出国出境深造的则占57%，还有12%的毕业生暂未就业。在选择出国出境深造的559名毕业生中，其中187人(33%) 去了该中外合作办学外方母体学校所在的地区，251人（46%）去了与外方母体学校所在地区有密切联系的两个国家，96人（17%）去了美国，9人（2%）去了加拿大，16人(3%)去了其他国家和地区。

可见，虽然该校毕业生出国深造的比率事实上比西交利物浦、宁波诺丁汉要低，但是仍有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到国外境外接受研究生教育。并且，出国出境深造的地域主要集中在外方母体学校所在的地区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这一区域分布的特点在西交利物浦和宁波诺丁汉的数据上也有体现。

这一地域上的连续性表明中外合作办学具有一定的“绑定效应”。对学生而言，对本科阶段中外合作大学的选择会影响今后研究生阶段的留学地域；对海外大学而言，在中国建立中外合作大学可能会为该校、该国家（地区）、或者与该国家密切相关的国家或地区输送研究生阶段的留学生；对海外大学所在的国家(地区)而言，海外留学生的输入会促进当地的消费，如果一些留学生毕业后选择在当地工作，也会为当地输入人力资本。

来自质性访谈的数据同样支持关于海外留学的发现。小朔说，“家里也希望我将来去国外上学，我妈希望这个学校成为跳板……很多学生来这里上学都是想将来去XX[海外母体学校所在地]上学，或者去国外，去XX的居多一些……去XXA[海外母体学校]很容易。只要顺利毕业，GPA没有那么低的话，就差不多可以。”如同小朔所说，中外合作大学经常被学生看作出国留学的“跳板”，吸引着本科不打算出国但研究生打算出国的学生，也吸引着本科本打算出国但是因为成绩不理想而选择在国内就读的学生。这两种学生在本研究中都有遇到。在受访的十名同学中，仅有一名明确表示“我不打算出国”。

**社会关系网络的渗入效应**

该校的调研揭示出，社会关系网络在学生的院校选择和在校期间的学生生活中具有突出的作用。受访的多位学生都表示，选择该中外合作办学是由于亲戚或者朋友的推荐。正如小朔所说，“我妈有个朋友的孩子之前也是读的这个学校，食品专业，出去之后找工作还可以。我们听她说，觉得在这学的东西还挺实用的。”

与上海纽约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和宁波诺丁汉大学相比，这所中外合作大学的名气并不大，“很多人是不知道这个校名的”。这种身边人的切实经历可以帮助学生和家长消除误解。小艺介绍，“其实这个学校很多都是朋友介绍的。我也是从我妈妈朋友那里知道有这个学校的。其实，刚开始听说的时候，是抵触的，一听感觉是那种花钱就可以上的学校。但是高考完之后，发现分数也上不了太好的学校，就开始了解这个学校。了解完这个学校的具体情况之后，发现这个学校并不是我想的那样，野鸡大学，给钱就上，然后就接受了。”

如果说很多考生和家长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知道和了解这所学校，一些家长在为孩子报考这所学校的时候，也有建立社会关系的考虑。有同学说，“本科最好在国内读，爸妈希望自己在国内积累一些人脉。”本科阶段是学生独立走向未来职业的开始，而且大学与中学不同，是按照院系和专业来组织教学，本科阶段的同学很可能将来会成为行业内的朋友。

这种建立未来社会关系网络的考虑有时甚至会和社会分层联系起来。有同学反映，“家长会说，来这个学校的都是有钱人。”的确，一年六万或者八万的学费并非普通家庭可以承受，该校虽然有奖学金，但是极少学生可以靠奖学金来解决在该校接受教育的主要费用。这就使得，同学们在该校所发展出来的朋友圈是较为封闭的，通常只限于较为富裕的家庭的孩子，其成员几乎很难来自社会底层。

该校的管理者也利用朋辈关系来影响学生的校园融入和学习参与。该校学生按院舍来安排学生住宿，院舍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该校的社团活动非常丰富，绘画、扎染、剪纸、古琴、珠宝设计、时装设计、舞狮等等，这些社团活动为学生提供了跨专业的交往空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校组织了专门的朋辈辅导项目(peer mentoring program)。 在每个小组中，学长学姐2个人带领8-12个新生, 历时大一两个学期，帮助新生适应院校环境和大学学习。每组还配有一名老师，但是老师的参与程度各异，有的与学生经常“喝下午茶”或者“打保龄球”，有的则一个学期见一次。受访学生似乎与小组长和小组成员建立起很好的关系，在访谈中，学生们戏称带组的学长学姐为“组爸组妈”，而优秀的小组成员可以申请成为未来新生的“组爸组妈”。

**教育的形式与内容的推拉效应**

研究发现，学生和家长对教育形式和内容的看法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就学选择具有明显的推拉效应。受访学生小南提到，“看到这个学校实行博雅教育、全英教学，感觉这个学校和内地的那些教育方式不大一样。因为高中的时候，对应试教育反感嘛，觉得太过于应试。然后想这个学校可能会学到一些更实用的东西，至少在全英教学下，这四年的英语也会有一定的提高。所以就报了这个学校。”该生在前面讨论性价比的时候也提到，“你花这么多钱，四年时间，买的不是考试、傻学习，那也值得。”

就像发生在小南身上一样，对国内“考试”、“应试教育”、“傻学习”的“反感”构成学生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推”的力量。同时，中外合作办学经常宣扬的“博雅教育”、“全人教育”的教学理念、“更实用”的教学内容、采用的“全英教学”、“非一考定终身”、“领导力培训”等教学方式和手段，则成为促成学生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拉”的力量。

目前，尤其是在城市中产阶级中，对我国教育的形式与内容存在较大的不满。当海外留学之门打开、城市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上升之后，这部分人选择用脚投票，让孩子去海外接受高等教育，有的在高中毕业时入读海外学校，有的甚至在更早的时候选择投资移民等手段将孩子在接受高等教育前即送到海外。因为在本科或者高中阶段即在海外接受教育，这部分学生更认同海外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在语言和文化融入上更加成功，将来也就更容易留在海外工作。虽然其中的很多人也会选择最终回国就业，但是海外留学还是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中国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流失。而中外合作办学通过在国内提供带有鲜明西方特色的、被认为是非应试的高等教育，为那些不想在本科阶段出国和未能成功出国读本科的同学提供了一种教育选择。从这个意义上，中外合作办学缓解了我国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流出。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学生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个人需求入手，探讨了该需求的特点以及对我国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学生而言，对我国应试教育的不满和对西方高等教育的向往成为其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内在动力。中外合作办学使得其目标学生群体能够在国内接受本科教育，为学生在从基础教育走向未来职业的关键阶段搭建和发展国内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为研究生阶段的留学或去发达地区的外向型行业就业奠定基础。对于已经选择就读于中外合作大学的学生，就学成本似乎不是问题，但是鉴于其相对高昂的学费，入学选择本身即成为社会分层的结果，学生们在校期间发展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因此带有封闭性的特点。对于中外合作办学所在地而言，中外合作大学不仅能够成为城市的文化标志，还能带来学生就学期间的消费和毕业后净人力资本流入。对于外方母体大学及其所在国家或地区而言，开办中外合作大学不仅会提高外方大学在中国的知名度，而且会通过锁定效应，为母体大学和母体大学所在国输送大量研究生阶段的留学生。对于我国而言，中外合作大学成为我国学生出国潮中缓冲带，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我国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外流。

研究证实，对中外合作大学的选择既是经济行为，也是社会行为和教育行为。对中外合作大学性价比的思考体现了对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的考量，对消费和人力资本的吸引也带有区域经济的色彩，可以借鉴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Hossler, 1989)。社会关系网络在中外合作大学就学选择和就学过程中的突出作用则凸显自我和环境互动，可以借鉴社会学的视角(Jackson,1982; Litten,1982)。学生对就学地域的选择与靠近就业地的经济学考量有关，同时地域文化本身也带有吸引力。而教育内容和形式的推拉效应作为学生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核心内在动力，则属于教育学和高等教育学的范畴。

本研究拓展了已有的中外合作办学需求研究。杨辉(2003)从需求的角度将中外合作办学的就读学生分成如下六种类型：高考落地型、目标留学型、经济制约型、就业需求型、岗位提高型和文凭需求型。本研究发现，与其说这是六种不同的学生类型，不如说这是学生需求的不同维度。同一学生身上经常呈现出不同的需求维度。本研究聚焦的大学所主要针对的是高考成绩达不到211院校的分数、将来打算出国或在外向型行业就业，希望接受全英教育、博雅教育和西方专业教育、家庭对十万左右的年开销有支付能力的学生。

对中外合作大学需求的满足归根到底取决于中外合作大学的质量。本研究发现，该校学生对教师的资历满意，认为其显著超出国内同水平高校的师资，但也有学生抱怨教师更替频繁。该校学生的努力程度似乎普遍高于国内同水平大学。在调研中，学生向研究者抱怨，这个学校“从开学考到期末，每个星期都有Quiz”，学生“熬夜是常态，三四五点还亮灯”，需要“把写作业当成习惯”。学生反映，如果两个学期绩点低于1.67，就会被劝退。该校的入学和毕业数据也显示，2011年该校录取1239名学生，2015年毕业988名学生。这其中一定有自愿退学或者延期毕业的学生，但也一定有因为学业原因被劝退的学生。虽然学得很累，学生似乎对在中外合作大学受到的教育满意。有同学说，“我有很多同学上了985、211的学校，感觉自己没有学到自己想学的，感觉很失望。我自己抱怨辛苦，我上学期最晚早上五六点钟睡。我的同学认为我在这里受到的教育更好。” 从入学成绩来讲，这所中外合作大学生源远不如985、211院校，但从毕业生就业和深造的角度来讲，学生的表现似乎并不逊于211院校，在出国比例等指标上，甚至似乎超过985高校。这当然与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有关，但中外合作大学可能还是对人力资本的提升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学生的学习参与可能是此过程中的重要中间变量。这些有待在下一步的研究中予以验证。

**参考文献**

Hossler, D., Braxton, J., & Coopersmith, G. Understanding Student College Choice. [G] // SMART J D (Ed.). *Higher Educatio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NY: Agathon Press, 1989: 231-288.

Jackson, G. Public Efficiency and Private Choice in Higher Education[J]. *Educational Evaluation & Policy Analysis*, 1982, 4(4):237-247.

Litten, L. Different Strokes in the Applicant Pool: Some Refinements in a Model of Student College Choice[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1982, 53(4):383-402.

杨辉. 从需求市场看中外合作办学[J]. 教育评论, 2003(5):8-11.